

· 中宣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专栏 · 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二十七） ·

奇点时刻与普罗米修斯维度：AI时代人类共同历史叙事的危机与重构

吴晓群

【内容摘要】 技术突破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人类文明的根基。无论奇点是否真的已经降临、其效果能否达至对人类的根本威胁，这些技术突破与叙事变迁都在很大程度上共同构成了一场深刻的历史意识危机。为了给人类应对技术挑战和思想冲击提供意义框架与方向指引，以“奇点时刻”与“普罗米修斯维度”为分析工具，能帮助历史学家系统剖析人工智能对人类文明的不可逆改变，揭示技术突破如何将人类置于创造与毁灭的双重可能之中，并通过共同历史叙事重构人类的意义世界。由此或能实现从“智能稀缺时代”到“智能丰裕时代”的文明跃迁，最终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技术时代的浪潮中守护并重塑人类的意义世界。

【关键词】 奇点 普罗米修斯维度 共同历史叙事 人工智能 人类一体性

【作者】 吴晓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暨西方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上海 200433）

技术奇点与历史意识的危机

2026年2月2日，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AI已具备人类水平的智能了吗？证据清晰可见》的重磅文章。文章的四位作者包括哲学家、语言学家和科学家，他们指出，当前的大语言模型已经具备了人类水平的通用智能(AGI)，实现了艾伦·图灵(Alan Turing)在1950年的愿景；尽管这种机器智能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不同于生物智能的“异类”特征，但这标志着人类在通用智能领域已不再孤独，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①一个星期后，HyperWrite (OthersideAI)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特·舒默(Matt Shumer)在社交平台X上发布了一篇题为《大事正在发生》的文章，该文在48小时内阅读量突破8200万，被《财富》、CNN等媒体报道，引发了关于AI发展速度的广泛讨论。文章的核心观点是，2026年2月5日



OpenAI 发布的 GPT-5.3 Codex 与 Anthropic 发布的 Claude Opus 4.6 标志着 AI 能力跨过一个临界点。由此，舒默认为，AI 正从辅助工具转变为能够“独立思考”甚至参与自身开发的自主实体。^②又一个星期后，在中国的春节，中文科技界也流出一篇题为《我们，已迈过奇点》的文章，作者断言，奇点已经到来，文明运行的基本逻辑正在过时。^③

这三篇文章在仅仅两个星期的时间内相继出现，且共同指向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性转变：技术发展已经抵达了一个临界点，在此之后，人类对自身、对历史、对未来的理解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动摇。

正如普罗米修斯从众神那里盗取火种赠予人类，既带来了文明的曙光，也招致了永恒的惩罚，人类在获得近乎无限的智能生产力的同时，也释放了一种可称之为“普罗米修斯维度”的双重力量。一方面，AI 有可能将一个世纪的医学研究压缩在十年之内完成，攻克癌症、阿尔茨海默病甚至衰老本身；^④在历史研究中，也可以成功释读残缺的古代铭文、历史手稿或进行档案字符转写、史料量化分析等。^⑤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催生无法预测的风险，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构建极权监控体系，或以其不可理解的“黑箱”逻辑将人类推向边缘。^⑥如果说普罗米修斯盗火的神话象征着人类通过技术与智力挑战自然与神圣秩序、争取自由与进步的原初冲动，那么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普罗米修斯维度”全面展开的时代——人类掌握了物种层级的力量：核能、生态干预、生物技术、算法智能，这些力量一经发明便无法撤销，且可能彻底终结文明。而“奇点”理论指的正是人工智能处在超越人类智力、能够自我迭代与自我改进的临界点。在这一时刻之后，技术进步不再是以往的线性增长，而是进入指数级爆发、不可预测的“智慧爆炸”阶段。^⑦“奇点”概念的流行，进一步将那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力量投射为一种关于未来的叙事：技术增长将在某一时刻失控，机器智能将超越人类智慧，历史将发生断裂，进入一个无法预测的新纪元。^⑧正如赵汀阳 2024 年提出的，“今天我们人类正在开创一个新的历史性，而这个新的历史性是跟人工智能有关的，人工智能一旦突破了奇点，这个世界就拥有了双主体，人类和人工智能的双主体……”。^⑨对于这个新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思考？

的确，面对一个技术突飞猛进、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这种预测并非空穴来风，也非杞人忧天，由此，我们不得不追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作为人类这一整体，我们是否还拥有讲述自己故事的能力？是否还能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编织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是否还能在技术浪潮的冲击下，保持对“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的连贯理解？

这些问题之所以紧迫，是因为任何人类共同体的凝聚力，都依赖于一种共享的历史叙事。从远古神话到民族国家史，从宗教经典到启蒙进步观，历史叙事赋予共同体以意义：它讲述共同体如何形成，如何获得并表达其核心特质与价值观，如何理解自身的现状，如何预期未来的展开，如何构想历史的终极目标或方向。成为某一共同体的一员，即成为历史的主体、共同叙事的主角，并参与这一叙事的展开过程。一个缺乏共同历史叙事的共同体，在面对挑战与危机、迈向未来时，将无法凝聚焦点、目标与方向。^⑩换言之，真正的问题并不是 AI 会不会取代人类，而是人类能否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

或许有人认为这种对问题的预见或担忧过于超前，就目前而言，至少尚未出现 AI 自主书写的历史作品，人工智能也没有大面积入侵史学领域。因此，AI 成为历史的制造者以及 AI 历史叙事带来的问题和危机都还只是预言式的提前忧虑，不在历史学家的研究范畴之内。然而，正如徐贲在谈及 AI 时代的文科危机时所尖锐指出的：“文科通常的自我安慰叙事是这样的：AI 替代了



理工科的核心能力，文科因其‘不可量化性’而得以幸存，甚至崛起。这个叙事令人欣慰，但它回避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真相：文科的‘幸存’，并非因为自身固有优势，而是因为人类整体的判断力仍未被机器完全替代——文科自身若不转型，它不过是在用一种更慢的速度走向同样的终点。”“AI对文科的冲击，本质上不是替代或外包，而是结构性的显影和揭穿……问题不在于文科是否面临风险，而在于它所依赖的某种存在方式，今天，我们熟悉的‘文科’已经进入结构性不可持续的阶段。”^⑩

众所周知，历史学家的工作以及历史学存在的基本理由就在于追问因果，如果没有因果的逻辑，历史就变成了一份无限长却没有重点的事件清单。事实上，在每一次时代转变的关键时刻，历史学家从未缺席，更没有拒绝思考。如果说，历史学家对于过去的解释，是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建立事件及人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使得人类的过往变得可理解、可讲述。那么，同样地，历史学家也能基于现实判断而产生对于未来历史书写走向的设计和构思。因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种忧虑既是必要的也是真实的。因为，即便对奇点时刻是否已经到来及其真正影响力有多大尚有争议，人类在面对一次次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普罗米修斯之火”的考验之同时，不得不正视当今史学界在阐释思想巨变时的无力；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宏大叙事已然瓦解，其线性进步观、欧洲中心论、物质主义取向早已遭到学术界和公众意识中的普遍质疑；而后现代思潮对一切宏大叙事的解构，虽带来了思想解放，却也导致了意义的碎片化与社会共识的瓦解。在此背景下，地方性的、民族性的、族群性的历史叙事纷纷复兴，它们彼此竞争、相互冲突，却无法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提供共同的想象。

当“奇点”叙事兴起，宣称历史即将断裂、人类即将被超越时，这种历史意识的危机更是达到了顶点：如果历史真的将在奇点处终结，那么一切关于过去的叙事、关于未来的规划，岂不都失去了意义？因此，在这场关于人类未来命运的事业中，历史学家有必要反思过往历史叙事的结构性问题并思考解决方案。本文认为，人类唯有发现并重新构建共同的历史叙事，才能在人工智能爆炸的混沌中锚定文明的方向，确保技术始终服务于人类整体的福祉。为此，我们将从三个层面展开论证，首先，追溯“奇点”与“普罗米修斯维度”的概念谱系，揭示其作为分析工具的思想价值及其局限；其次，剖析AI时代历史意识的四重危机，阐明构建共同历史叙事的紧迫性；最后，重点分析如何在AI时代构建一种共同的历史叙事模式，探讨如何在本体论层面确认人类一体性、在认识论层面发展人机协同的方法论、在实践层面书写共有历史，从而在技术时代的浪潮中守护并重塑人类的意义世界。

“奇点”与“普罗米修斯维度”：作为分析工具的概念谱系

（一）“奇点”概念的生成与演变

“奇点”（singularity）一词最初源于数学与物理学。在数学中，它指函数取值未定义的点；在物理学中，它指黑洞中心或宇宙大爆炸起点，在那里已知的物理定律失效。^⑪1965年，英国数学家古德（I. J. Good）首次将这一概念引入技术领域，提出“智能爆炸”假说，他认为如果机器能够设计出比自身更聪明的机器，这将引发智能的递归式增长，人类智能将被远远甩在后面。^⑫1993年，科幻作家弗诺·文奇（Vernor Vinge）在NASA的一次研讨会中系统阐述了“技术奇点”概念，认为在未来三十年内，人类将具备创造超越人类智能的技术手段，此后的时代将超出我们

当下的理解能力。^⑭2005年，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出版《奇点临近》，将这一概念进一步推向公众视野，他在书中系统阐述：技术发展遵循指数级增长规律，将在某一时刻达到一个临界点，此后人工智能将能够自我迭代、自我改进，创造出比自身更聪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他预言，2045年人类将与机器融合，进入智能爆炸的新纪元。并且，由于机器的智慧远超人类，奇点之后的世界将无法被预测和理解。^⑮

库兹韦尔的奇点理论包含的几个核心要素，在舒默看来似乎都正在或即将变成现实：其一，指数级增长假设——技术进步不是线性的，而是加速的，其曲线将在奇点处变得近乎垂直；其二，递归自我改进——一旦AI具备自我改进能力，它将进入一个循环加速的轨道，如将一百年的研究压缩到十年之内；其三，不可预测性——由于超级智能的思维方式远超人类理解范围，奇点之后的世界状态无法被预先知晓；其四，人类命运的重新定义——人类可能面临被超越、被融合或被取代等多种可能。^⑯

其实，自库兹韦尔以来，奇点概念已经历了多次理论演化。在技术乐观主义者那里，奇点被视为人类解放的终极希望——通过人机融合、意识上传，人类将摆脱生物局限，实现永生与无限创造。在技术批判者那里，奇点则意味着人类历史的终结、人类主体性的丧失，甚至人类物种的灭绝风险。而在近年的公共讨论中，随着大语言模型的爆发式发展，“奇点临近”甚至“奇点已过”的论调频繁出现。在2026年初中文社交媒体的一篇文章中，作者直言：“奇点不会通知你。它过了你才知道”，“具体是在什么时候？说不准。可能是Claude Code之后，可能是OpenClaw爆发之后，可能是某个我们都没留意的时刻”。^⑰这种表述将奇点从遥远的未来拉入当下的日常经验，使之成为一种弥漫性的时代氛围。当METR预测在未来一年内AI可实现独立工作数天；^⑱当OpenAI发布声明称，最新模型“在创建自身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⑲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便尚未完全跨越奇点，人类也已站在这一门槛之上。

当然，作为一种理论分析工具，一方面，奇点概念存在明显的局限。首先，它本质上是技术决定论的——将历史变迁的动因归结为技术自身的指数级增长，忽视了社会、政治、文化、伦理等维度的能动作用。其次，它预设了一种断裂式的历史观——将奇点视为历史的终结，实则剥夺了人类在历史中行动的意义。最后，它缺乏对技术发展方向的价值审视——技术越强大，越需要追问“向何处去”“为了谁”的问题，而奇点叙事恰恰回避了这些问题，将技术进化的方向视为不可阻挡的自然规律。

另一方面，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审视，“奇点”概念也蕴含着深刻的时代意涵。首先，它标志着历史连续性的断裂。过往的历史书写依赖于稳定的时间结构与可预期的未来图景，^⑳然而，奇点之后，人类无法依据过往经验预测未来走向，历史思维赖以存在的时间连续性与因果链条被根本性动摇。其次，它挑战了历史行为主体的定义。当AI不仅是研究的工具，更成为“历史制造者”，能够自主生成叙事、提出假设甚至参与自身迭代进化，^㉑那么，人类作为唯一历史主体的地位便面临严峻挑战。第三，它迫使历史哲学重新审视“进步”的内涵。线性进步的启蒙叙事曾是现代史学的主导范式，^㉒但当“进步”本身加速到难以理解的程度，当“进步”可能导致人类的边缘化乃至被取代，这一概念便失去了其固有的积极意涵。

（二）“普罗米修斯维度”的学术内涵与历史表达

如果说“奇点”指向技术发展的临界状态，那么“普罗米修斯维度”（Promethean Dimension）则揭示了这一发展进程内在的双重性。在古希腊神话中，古老的泰坦神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送给



人类，使人类获得了文明的基础——技艺、知识与希望。但他也因此遭受宙斯的惩罚，被缚于高加索山崖，每日承受恶鹰啄食肝脏之苦。普罗米修斯的行为还连累了人类，致使宙斯创造潘多拉，将各种灾难撒向人间。^{②3}这一神话象征着人类通过智慧和技术挑战自然与神圣秩序、争取自由与进步的永恒冲动，同时也揭示了这种冲动的双重性：每一次“盗火”般的飞跃，都伴随着必须被审视的责任与潜在的反噬。^{②4}由此，“普罗米修斯维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具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分析框架。

事实上，在思想史上，“普罗米修斯维度”这一隐喻被广泛运用于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与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普罗米修斯是启蒙原型”的核心命题：启蒙理性最初旨在用知识破除神话、解放人类，却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它成了一种新的神话；普罗米修斯盗火象征着人类通过工具理性支配自然，但这种支配最终演变为对人自身的支配。^{②5}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在《责任原理》中警告：现代技术文明的“普罗米修斯式力量”赋予了人类近乎神的力量，如核能、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却缺乏相应的智慧和责任约束，若不加以伦理规制，将导致无法挽回的生态灾难和人类生存危机。^{②6}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则在《希望的原理》中将普罗米修斯视为“反抗神权、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乌托邦象征”，代表了人类对解放和“尚未存在”的渴望。^{②7}

综观以上论述，普罗米修斯维度的核心要义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一是技术理性的双重性。人类凭借技术从自然中解放，获得自主性，但技术理性也可能变为新的支配性力量，控制自然、社会乃至人性本身。其二是现代性的根本矛盾。现代性的核心动力是对传统和自然限度的“普罗米修斯式反抗”，追求无限进步与掌控，但这种反抗内在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生态危机、工具理性膨胀、意义丧失。其三是乌托邦与灾难的并存。普罗米修斯既是创造者和解放者，又是受难者和挑衅者，因而同时蕴含了希望与风险。其四是责任伦理的呼唤。面对现代技术赋予的“普罗米修斯式力量”，必须发展出一种与之匹配的、面向长远后果的责任伦理。

当我们将这一维度引入对 AI 时代的分析，其内涵尤为深远。一方面，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增强人类能力：知识获取的平民化、科学发现的加速、医疗技术的突破、跨文化理解的深化——这些无不体现着“普罗米修斯之火”的创造力。正如舒默所言：“你的梦想离实现更近了……你可以向 AI 描述一个应用程序，一小时后就能拥有可运行的版本。”^{②8}另一方面，AI 也释放了同样巨大的破坏性潜能：算法偏见固化社会不公、智能监控威胁个人自由、虚假信息腐蚀公共讨论、自主武器系统引发伦理困境——这些正是“普罗米修斯之缚”的当代呈现。更根本的挑战还在于，当 AI 开始参与自身设计迭代，人类可能面临“失控”风险：一个远超人类智慧的实体，其目标和价值观可能与人类福祉相悖，而人类甚至无法理解其决策逻辑。^{②9}

（三）智能无限与叙事断裂：作为历史分析工具潜力

将奇点理论与普罗米修斯维度并置考察，可以发现二者既有深刻共鸣，也有根本分歧，恰可互为补充，形成一种更具洞察力的历史分析框架。

其共同之处在于：第一，两者都指向人类正在或即将掌握的“神级技术”。如果说普罗米修斯盗取的是“火种”，意味着文明的起源；那么奇点带来的就是“创造智能”，是文明的终结或升华。第二，两者都强调技术突破的不可逆后果。一旦获得这种力量，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第三，两者都包含对“代价”与“惩罚”的警示。普罗米修斯因盗火而被缚；在奇点叙事中，人类获得超级智能的“代价”可能是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控制权。

其根本差别在于：第一，主体不同。普罗米修斯维度中，力量是从外部（神界）盗取的，强调了人与更高力量之间的对立和僭越关系；奇点理论中，超级智能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强调了人与自身造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二，后果的性质不同。普罗米修斯维度的后果是明确的、悲剧性的“惩罚”，在已知的人类伦理框架内；奇点理论的后果是彻底的未知，可能超越所有伦理框架，现在还无法用“好”“坏”定义。第三，时间的流向不同。普罗米修斯维度仍然是在人类历史内部发生的故事，是关于英雄、牺牲和命运的循环叙事；奇点理论标志着人类历史的断裂，在奇点之后，熟悉的历史叙事可能会结束，人类不再是故事的主角。

作为历史分析工具，二者的互补性在于：普罗米修斯维度提供了对技术发展的伦理审视和责任框架，提醒我们技术越强大，就越需要追问其目的和价值；奇点理论则揭示了技术发展的指数级加速度和潜在的断裂性，迫使我们思考历史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之间的关系。若将二者结合，可以形成一种既关注技术突破的文明意涵、又警惕其风险与代价的分析视角。由此，二者正可作为考察 AI 时代历史意识危机的理论工具。

将上述两个概念的讨论引向历史哲学的核心，我们发现，奇点时代最深刻的危机或许不是技术本身的失控，而是历史意识的危机，即人类丧失了理解自身处境、想象共同未来的叙事框架。笔者曾指出：“人类集体的凝聚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某种共同的历史叙事。共同的历史叙事模式不仅决定了特定共同体的思想观念与行动方式，也决定着共同体成员如何理解现状及书写未来。没有共同历史叙事的人类集体，是无法从容面对危机与挑战的。”^⑩然而，在奇点时代，这一基础可能面临瓦解的风险。

AI 时代历史叙事的危机

在普罗米修斯维度与奇点理论的映照下，AI 时代的历史意识危机，本质上是“叙事断裂”的危机。这场危机并非仅仅源于技术发展本身，更源于技术发展所引发的认知框架、时间意识、主体观念和叙事模式的根本性动摇。它既表现为叙事主体的模糊与异化，也表现为叙事框架的失效与滞后，更表现为叙事意义的消解与困惑。具体而言，这种危机呈现在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一）时间收束与空间重组：历史连续性的断裂

众所周知，历史学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时间。现代史学赖以组织经验的时间结构——无论是线性进步的启蒙叙事，还是循环往复的文明周期理论——都预设了某种程度的连续性与可预测性。换言之，时间顺序是历史学的骨架，时间观体现着历史学的价值取向，时间节奏是历史学的研究尺度。^⑪然而，大语言模型（LLM）的运作方式，恰恰对时间性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

大语言模型的知识输出背后是一个形式化的、可理解的过程：文本被分解为词元，转化为向量，在高维空间中计算关联性。在这个过程中，没有预设的时间秩序，“符号与符号之间构成了一个无限又无序的网络。这导致其输出的历史文本很容易产生无时间的‘扁平感’和或隐或显的‘时代错置’”。^⑫换言之，大语言模型处理的是一种共时性的、空间化的信息网络，而非时间性的历史进程。它擅长同时处理海量信息，却难以理解“从过去到现在”的复杂演变。

19 世纪以来，历史学确立了以时间线索组织叙事、以因果逻辑解释变迁的基本范式。从兰克的“如实直书”到年鉴学派的“长时段”，从历史主义的发展观到现代化理论的阶段论，时间始终是历史解释的核心维度。然而，当大语言模型以其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介入历史知识生产时，



它潜移默化地推动着一种从“时间优先”向“空间优先”的转变：相关性取代因果性，共时性网络取代历时性进程，空间模式取代时间叙事。奇点之后，智能呈指数级爆发，技术发展速度超越任何既有框架的捕捉能力。当 AI 自身无法处理时间的深度，人类又如何期待借助 AI 构建具有时间厚度的历史叙事？

叙事框架失效的同时，空间本身也在被重新定义。数字人文的“空间转向”试图突破文本叙事的线性限制，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深度绘图（deep mapping）、空间叙事（spatial narrative）等技术，探索在空间中展开历史叙事的可能。^⑤这种探索本可为历史学提供新的表现维度，但若失去时间维度的支撑，空间叙事会在丰富线索的同时，将历史力量“平均化”；在聚合历史经验的同时，无法再识别出具有本质意义的时刻。^⑥

（二）概率思维与因果逻辑：历史解释的范式挑战

与时间收束相伴随的是因果逻辑的动摇。现代史学的核心追求之一，就是对历史事件之因果关系的解释。换言之，追问“为什么”始终是史学研究中最普遍的问题类型。^⑦从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因的分析，到马克思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因果解释均构成了历史叙事的深层骨架。

然而，大语言模型的运作遵循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逻辑——概率。它不是通过理解因果关系来生成文本，而是通过计算词元之间在统计意义上的关联强度，预测下一个最可能出现的词元。作为一种基于海量数据训练的概率性统计模型，大语言模型不具备内在的世界观、知识体系或自主逻辑。其存在形态表现为高维空间中的向量组合，内容生成机制遵循统计概率准则。这种运作模式与历史学科所遵循的实证性、因果性与叙事性思维范式存在根本性分歧，这使得其生成的文本在本质上区别于真正的历史叙事。因此，它所呈现的关联，本质上是一种“伪相关”，它可能揭示 A 和 B 在文本中经常同时出现，却难以阐明两者的因果关系。正如范丁梁所警示的：“大语言模型所提供的概率模型并不揭示事实发生本身的概率，而只是展现人类描述事物之语言表征的概率。因此，它们在大幅度提升知识生产效率的同时，并不必然提升其价值。”^⑧

这种概率思维对历史解释构成了双重挑战。一方面，它可能导致对历史理解的浅表化，将复杂的历史因果关系简化为数据模式识别，将多元的历史动因压缩为统计规律。另一方面，它还可能催生一种新的“解释霸权”：当 AI 生成的解释因其规模优势而被视为“客观”“科学”时，那些无法被数据化的历史因素，如个体能动性、情感动机、价值选择等就可能遭到系统性忽视。

如若历史学家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概率思维，便可能丧失对历史复杂性的感知能力，甚至沦为“算法决定论”的俘虏。更关键的是，人类历史叙事的意义也就被消解了。因为在概率思维的基础上，“智能无限生产”意味着认知劳动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⑨那么基于知识积累与信息处理的传统史学工作便面临价值危机。当 AI 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完成人类学者需要一周才能完成的文献综述，当它可以生成看似合理的历史叙事而无须理解其中的情感、价值与伦理维度，历史学的“求真”使命与“意义建构”功能便需要重新定义。正如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言，技术既是“解药”也是“毒药”。^⑩

（三）人类主体性的消解与“普罗米修斯的羞愧”

当 AI 具备超越人类的智能，能够自主生成历史分析、提出科学假设、参与社会决策，人类作为唯一历史行动者的地位便不复存在。约书亚·斯特恩菲尔德（Joshua Sternfeld）在《作为历史学家的 AI》一文中指出，AI 运作与历史研究在过程上惊人地相似：都包括收集数据、分类、分析、

解释、存储以供未来使用。因此，运作 AI 的过程本身即体现着历史意识——记忆、批判性分析、语境化与因果推理。^③当 AI 成为“历史制造者”，人类的主体性产生动摇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人类如何定位自身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在历史认识与书写中，“人”的位置又在哪里？

对这种叙事主体瓦解的焦虑早已在哲学层面有深刻的先声。德国哲学家京特·安德斯(Gunther Anders)在《过时的人》中提出了“普罗米修斯的羞愧”这一概念：在绝对规范、系统的机械规则的影响下，人开始羞愧于自己的“非标准化”和“过时”，甚至主动追求一种可被量化的存在形式，“人认可了物的优越性，把自己与物等同起来，肯定了自己的物化，并将自己未物化的部分视为一种缺陷”。^④在 AI 时代，这种羞愧可能会以新的形式呈现：当 AI 能够更高效地处理史料、更准确地识别模式、更流畅地生成文本时，历史学家是否也会陷入某种“羞愧”——诸如自己的记忆不如 AI 准确、自己的分析不如 AI 全面、自己的写作不如 AI 流畅？

然而，历史学的本质恰恰在于那些无法被量化的维度。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指出：“人类不仅是最复杂的自然实体，且极具变化性，而且人类必须由其他人类来研究，而不是由其他物种中的独立观察者来研究的……历史学家需要深究人类行为的各种形式，这其中意志是最为活跃的；需要确定他的研究对象的人，为什么会像他行动的那样去有意识地行动。这就在观察者和被观察事物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则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所特有的属性。”^⑤这种“人研究人”的关系，这种对人类经验、情感、价值、选择的共情理解，恰恰是 AI 作为一种从未体验过人类生活的存在所无法企及的。

(四) 叙事的分裂与霸权：共同历史叙事的多重困境

上述危机的最终表现，是叙事层面的分裂与霸权并存。一方面，在“宏大叙事终结”的后现代氛围中，历史叙事呈现出高度的碎片化。女性主义史、后殖民史、微观史、新文化史等多元视角的兴起，固然极大地丰富了历史认知，却也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想象变得日益困难。当每个群体都强调自身经验的独特性、不可通约性时，一种能够整合多元经验、贯穿历史全程的共同叙事便难以形成。另一方面，新的叙事霸权正在悄然形成。首先是技术叙事霸权。以“奇点”为代表的未来叙事，正日益主导公众对未来的想象。这种叙事将技术发展描绘为不可阻挡的自然规律，将人类命运交付给算法进化的“必然”进程，实则剥夺了人类集体行动的意义与可能。其次是数据霸权。AI 的训练数据严重偏向精英叙事和强权叙事，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历史记忆被系统性消音；非英语世界的知识成果被低估，形成“机器解释霸权”的风险。^⑥最后是资本叙事霸权。当顶级 AI 服务的月资费可达 200 美元甚至更高，当“一个人是否在用最好的 AI、愿不愿意燃烧 Token，直接决定了产出的质量”，^⑦一种基于智能消费能力的新的不平等正在形成，它可能在未来转化为对历史叙事权力的垄断。

而美国特朗普政府于 2025 年 11 月 24 日启动的“创世纪计划”(The Genesis Mission)^⑧，可以说正是叙事分裂与霸权的典型代表。该计划是一项旨在通过国家力量整合人工智能与尖端科研设施，以加速科学发现、巩固美国技术霸权的国家级战略工程。它将利用美国过去几十年积累的世界最大的联邦数据集来训练封闭的科学基础模型，这意味着高价值的科学数据不再是全人类共享的资源，而是被视为国家战略资产的核心。计划中不乏“全球技术主导地位”(global technology dominance)、“能源霸权”(energy dominance)等表达，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该计划的目的是让美国赢得这场比赛并保持领先。当这份官方文件将 AI 计划明确与二战中研发原



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相提并论时，它就不仅是技术领域的重大举措，而在更深层次地预示着全球科技叙事从“开放合作”向“国家竞争与阵营化”的深刻转变，是美国试图主导未来科技秩序、重塑全球权力结构的战略工具。它旨在分裂全球性的技术生态，从而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排斥战略对手的霸权体系。这一计划若顺利推进，可能会引发一场新的“科研冷战”，将全球拖入技术阵营化对抗的深渊。可以说，“创世纪计划”是逆全球化在科技领域的极致体现。

上述四种危机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共同构成了一场深刻的历史意识危机。于是，在时间收束中，人类可能会失去对历史连续性的感知；在概率思维中，人类可能会失去对因果深度的追问；在主体性消解中，人类可能失去对“人”之为人的理解；在叙事分裂与霸权中，我们更可能失去对“我们”的共同想象。然而，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人类叙事危机，人类需要做的当然不是退回旧的叙事模式，也不是被动接受技术决定的未来，而是主动构建一种能够容纳技术突破、整合多元视角、指引未来方向的新型历史叙事——这正是“共同历史叙事”的时代使命。

构建 AI 时代的共同历史叙事

AI 时代历史意识的危机和困境，使得当前的全球文明史书写愈发无力回应“奇点时刻”带来的根本性挑战。对此，本文尝试提出构建共同历史叙事的三个层面：本体论层面的“人类一体性”确认、认识论层面的“人机协同”方法论以及实践层面的“共有历史”书写路径。这三个维度相互支撑、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框架。

（一）本体论层面：人类一体性作为叙事的根基

不能否认，任何历史叙事都建立在本体论预设之上，即关于人类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的根本假设。过往的宏大叙事之所以走向封闭或压迫，往往源于其错误的本体论预设：要么将某一文明的特殊经验普遍化，要么将人类本质简化为物质欲望，要么将历史进程归结为宿命论的必然。而要构建并发现一种既能整合多样性又不导致压迫的共同历史叙事，必须从本体论层面重新奠基。

“人类一体性”（*oneness of humankind*）正是这样一种本体论承诺。它肯定了在文化、民族、意识形态的现实差异之下，存在着一种更根本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具有多重维度：生物性的，作为单一物种的共同人性；社会性的，在全球化的时代日益显现的相互依存；精神性的，超越物质存在的共同渴望与能力。这种统一性并非否定或消除多样性，恰恰相反，真正的统一性需要通过多样性来实现。人类各群体犹如人体的不同器官，唯有通过整合于整体，才能发挥各自的功能，实现各自的潜能。

以人类一体性为叙事的根基，意味着：第一，任何关于人类历史的叙述，都应以“人类”作为基本单位，而非将某一文明、国家、族群的叙事自然化、普遍化；第二，任何关于文明差异的叙述，都应在人类一体性的框架中展开，将差异理解为统一性的多样表达，而非不可通约的隔绝；第三，任何关于历史方向的叙述，都应以人类整体的福祉为终极参照，而非以局部利益的扩张为目标。

这一本体论转向，将共同历史叙事从“建构”转向“发现”，也就是说，叙事之所以具有正当性，并非因为它获得了多数人的同意，而是因为它更忠实地对应了现实实然。笔者曾指出，共同历

史叙事是历史学家“有意识地”梳理和发掘既有共同历史叙事的过程。^⑤这一判断中的“既有”二字已预示了“发现”的维度，但还需要进一步强化这一本体论基础。也就是说，对于书写人类共同历史叙事的历史学家而言，他们的任务就是认识并呈现这种一体性在不同时代的表达方式，揭示那些被现有框架系统性遮蔽的关联与互动。这种一体性既是本体论的事实，也是历史展开的趋势，更是伦理追求的目标。这一本体论转向具有深远的方法论意义，因为它将共同叙事置于比“共识”更为稳固的基础之上，使其不会因政治风向变化或意识形态更迭而轻易被撤回。

在 AI 时代，这一本体论根基尤为重要。当 AI 能够生成无数种看似合理的叙事版本，当虚假信息与深度伪造技术使“真相”本身成为问题，人类更需要一个能够锚定叙事的本体论基础。如果一切叙事都只是“建构”的，那么 AI 生成的叙事与人类书写的叙事便没有本质区别，历史学的“求真”使命便无从谈起。但如果一体性是根本实在，如果共同历史叙事是对这一实在的“发现”与“揭示”，那么历史学家便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众声喧哗中辨识真理，在叙事竞争中守护真实。

（二）认识论层面：人机协同作为历史认知的新范式

在确立了共同历史叙事的本体论根基之后，我们需要一场深刻的认识论转向，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对历史书写的全新要求。这一转向的核心，在于重新审视历史认知的生成机制，这要求我们将“精神力量”（人类的意识、价值判断、文化记忆与伦理选择）与“物质力量”（智能算法、数据基础设施、计算能力与技术系统的自主演化）视为相互塑造、彼此渗透的有机整体，而非主客二分的孤立要素。

将这一框架应用于对 AI 时代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AI 的发展本身既是物质力量的产物（算力提升、资本投入、市场竞争），也是精神力量的体现（对未知的好奇、对人类福祉的关切）。AI 的应用既可以服务于物质力量（效率提升、利润最大化、消费刺激），也可以服务于精神力量（知识平民化、跨文化理解、伦理反思）。由此，历史叙事的任务，就是揭示这两类力量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互动方式，引导读者识别那些能够释放精神力量、驯服物质力量的路径。

更重要的是，这一框架提醒我们：AI 时代的历史书写不能仅仅关注技术指标、经济数据、政治博弈，而必须同时关注人类精神世界的变迁，即价值观的演变、伦理意识的觉醒和对意义的追寻等。历史学终究是以人类活动作为核心研究对象的学科，因此必须在有关研究中体现出人类在当下与过往之间的对话与思索。在智能无限的时代，这一人文关怀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应当成为历史书写的核心使命。

有关人机协同的想法，如今基本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不同学科的现实案例也在为此提供支撑性的力量。然而，仍有必要从认识论层面加以强调和提升，因为共同历史叙事的话语模式尤其需要发展出一种能够整合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的“人机协同”新范式。这不是简单地将 AI 视为效率工具，而是在承认 AI 独特优势的同时，守护人类品质的不可替代性，形成双向赋能的知识生产闭环。

张光伟提出的“元认知中间层”模型，为理解这种人机协同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分析框架。他将历史学家的认知活动类比为“前馈神经网络”：输入层对应于历史学家接触到的原始信息（史料、数据、其他学科的成果）；输出层对应于历史研究的最终成果（历史洞见、解释框架、叙事文本）；而中间层则是历史学家经过长期专业训练形成的深层认知结构——一种“元认知中间层”。^⑥在这



个模型中，AI的作用不是取代中间层，而是革命性地增强输入层、协同优化中间层、创新输出层的形态与“出口”。

具体而言，AI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赋能历史研究：第一，通过光学字符识别（OCR）技术、跨语言文献解析、空间信息结构化提取等手段，将过去难以获取或处理的多模态材料转化为可供分析的数据，极大丰富研究的“输入”；第二，通过“思维链”（Chain of Thought）等技术，辅助历史学家进行关联发现与逻辑推演，增强中间层进行深度加工的能力；第三，通过数据可视化、交互式叙事等方式，创新历史研究成果的呈现形态，拓宽历史知识输出的“出口”。^④

不过，AI的赋能必须以人类品质的守护为前提。在“元认知中间层”模型中，真正驱动价值升华的，是历史学家独有的四重能力：赋予“意义之网”的叙事能力，提供“时间智慧”的过程思维，注入“人文关怀”的价值判断，激发“反思性批判”的元认知能力。^⑤这些能力构成了历史学在AI时代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因此，理想的人机协同，应当是“让人工智能负责基础工作，学者专注价值创造”，^⑥也就是说，让AI处理海量文献、识别模式、提供线索，历史学家提出深刻问题、构建解释框架、进行意义阐释与价值判断。

（三）实践层面：共有历史的书写

如果说“共同的历史叙事”是一种有待实现的理想，那么“共有”二字应该就是通往这一理想的路标。所谓“共有”，首先意味着一种视角的根本转换，历史学家要将研究的出发点从“我者”与“他者”的对置，转向“我们”的生成过程。传统的历史书写，无论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还是以文明圈为边界，本质上都在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而“共有”视角的提出，则要求我们同时追问“我们如何成为我们”。这不是对前者之合法性的否定，而是对后者之真实性的发掘。吴于廑先生曾言，世界历史是横向发展与纵向发展的交织，而“共有”恰恰是横向发展的核心机制——人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锋，最终沉淀为某种共有的经验、记忆乃至情感结构。史家的任务，便是将这些在历史长河中时隐时现的“共有之丝”编织成可见的图景。

以此为基点，本文结合中国学者既有的理论思考，尝试提出实践层面的“共有”书写的三条路径：

其一，“共有”作为一种研究单位的重构。这种话语模式将不再以国家为单位，而是以“共有经历”为单位来组织叙事。^⑦由此，研究对象就不再由既定的政治边界或文明归属所定义，而由历史行动者之间的实际关联所决定。

其二，“共有”作为一种叙事逻辑的植入。传统的历史叙事，往往只是以单一的时间顺序为线索，而“共有”的叙事逻辑则是“关联的呈现”。它要求史家不仅讲述“发生了什么”，更要揭示“不同人群中发生的事情如何彼此构成”。换言之，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自我完成，而是与他者互构的结果。^⑧

其三，“共有”作为一种价值取向的自觉。21世纪以来，无论西方的还是非西方的学者都自觉保持对“西方中心论”的警惕。^⑨这种警惕是必要的，但若仅停留于此，则容易陷入另一种“中心”的循环困境之中。^⑩共同的叙事不是要创造一种新的中心，而是要揭示人类在面对共同挑战时所形成的共同智慧。^⑪

而将“共有历史”范式扩展至AI时代的人类文明史书写，则意味着：第一，关注技术发展中的跨国合作与知识共享，如国际科学合作项目、全球治理机制的演变、跨文明的技术传播与调适；第二，挖掘不同文明应对技术挑战的共有经验，如对技术异化的反思、对伦理规范的探索、对人

与技术关系的文化想象；第三，呈现那些被主流技术叙事遮蔽的“他者”声音，如非西方世界的技术实践、弱势群体的技术体验、替代性的技术发展路径。

（四）三个层面的整合：从“存在”到“方法”

上述三个层面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支撑、层层递进的有机整体。本体论层面的“人类一体性”确认，为共同历史叙事提供了根基与方向。它回答了“我们为何需要共同叙事”的问题。因为人类在根本层面上是一体的，这种一体性需要被认识、被表达、被实现。没有这一本体论承诺，共同叙事可能沦为工具性的政治建构，随时可能被权力逻辑所消解。构建共同历史叙事，这种历史哲学层面的理论自觉意味着，历史学家必须超越经验研究的局限，对人类历史的根本问题，如起源、动力、方向、意义等进行持续反思与系统建构。在 AI 时代，这种理论自觉尤其重要，因为技术突破正在重塑我们对这些根本问题的理解。智能是什么？意识从何而来？人与机器的界限何在？历史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这些问题不再是哲学家的抽象思辨，而是历史学家必须直面并回应的现实挑战。

认识论层面的“人机协同”范式，为共同历史叙事提供了方法与路径。它回答了“如何构建共同叙事”的问题。在 AI 时代，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需要形成双向赋能的知识生产闭环，历史学家需要以“元认知中间层”的身份，主导研究过程、守护人文价值。没有这一方法论创新，共同叙事可能停留在抽象的理念层面，无法转化为具体的研究实践。值得注意的是，AI 本身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认知伙伴”。如范丁梁所指出，AI 能够辅助史学研究在各个思维步骤上的提升，推进对历史学本质的认知。^⑤但这要求历史学家保持批判性思维，警惕算法偏见，坚守解释主体性。

实践层面的“共有历史”书写，则为共同历史叙事提供了范例与积累。三条历史书写的可能路线回答了共同叙事“从哪里开始”“如何展开”又“归于何处”的问题。归根结底，“共有”作为一种实践方案，其最高目标不是要写出一部“完美”的人类文明史，而是要培养一种“共有”的历史意识。这种意识既是对过去的重新发现，也是对未来的主动塑造。

总之，以上三个层面的整合，为 AI 时代的共同历史叙事构成了一个从本体论到方法论再到实践论的完整框架。这一框架既区别于那些无视差异、强求一致的“普世主义”叙事，也区别于那些固守差异、拒绝沟通的“特殊主义”叙事，而是在充分承认多元的前提下，寻求一种关系性的、生成性的统一——一种能够将技术突破与人文关怀、个体经验与集体命运、多元传统与共同未来整合起来的叙事模式。事实上，AI 的发展本身就是一部“共有的”历史——它汇集了全球不同文明的智慧，其成果惠及（或威胁）全人类，其治理需要全球协作。书写 AI 的“共有历史”，意味着关注不同文明对“智能”的理解如何相互影响，关注 AI 研究者跨国的学术网络如何形成，关注 AI 应用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如何被接受与改造，关注普通人在 AI 时代的共同体验与集体记忆。

结语

回望 2026 年初这个被《自然》杂志称为“图灵测试终结”的时刻，我们或许真的正在经历一次深远的历史转折。在马特·舒默那篇引发广泛共鸣的文章中，他以一种近乎痛苦的诚实写道：“我并非在写这篇文章来让你感到无助。我写它是因为我认为你现在能拥有的最大优势，就是比别人更早地理解它，更早地使用它，更早地适应它。”^⑥



本文的问题关切与之相似，但视角、愿景以及解决方案则有所不同。我们相信，面对 AI 时代的奇点挑战，人类需要的不仅仅是“适应”与“使用”，更需要一种能够凝聚共识、指引方向的“共同历史叙事”。这种叙事不是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封闭体系，也不是后现代主义碎片化的解构狂欢；不是西方中心论的单向度进步叙事，也不是民族国家框架下的竞争叙事。共同历史叙事的核心原则是人类的一体性，即一种生物性的、社会性的、精神性的根本现实，它既是过往历史中逐步显现的客观趋势，也是面向未来的规范性愿景，更是在危机中凝聚共识、指引行动的价值罗盘。

这种叙事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一体性是根本实在——生物性的、社会性的、精神性的。从雅斯贝尔斯揭示的“轴心时代”的精神共振，到怀特海阐发的宇宙创造性过程；从中国先贤憧憬的“天下大同”，到马克思预言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从当代史家书写的“共有历史”，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所有这些思想资源共同指向一个根本性的理解：在差异与分歧的表象之下，人类共享着同一个起源、同一个家园、同一个命运。

这种叙事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普罗米修斯式挑战”。当智能可以被无限复制，当认知的再生产不再需要额外成本，当一个人可以调度上百个智能体完成过去需要千人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人类文明运行的基本逻辑正在被根本性颠覆。在这一历史关口，如果没有一种能够凝聚共识、指引方向共同叙事，人类可能会陷入更深的迷失，不是在技术面前退缩，而是在技术之中迷失；不是在挑战面前失败，而是在机遇之中错失。

这种叙事之所以可为，是因为它能够起到如下作用：第一，整合技术突破与人文关怀。共同历史叙事将技术发展置于人类整体命运的框架中加以审视，追问技术“向何处去”“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防止技术理性蜕变为新的支配力量。它肯定技术的解放潜能，同时守护那些无法被算法量化的价值——意义、情感、伦理、美感。第二，贯穿过去与未来。共同历史叙事将奇点式的未来想象历史化，揭示其作为特定时代特定群体叙事的本质，而非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它同时将过去活化为面向未来的资源，从轴心时代的智慧到大同世界的理想，从共有历史的经验到人类一体性的洞见，过往的智慧可为当下的选择提供参照。第三，容纳多元文明智慧。共同历史叙事并非要以某一文明的叙事取代其他文明，而是要在充分尊重多元差异的前提下，寻求能够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的共同语言。它肯定每一种文明对“人类”这一共同体的独特贡献，同时追求将这些贡献整合进一个更宏大的叙事框架。第四，凝聚共识与行动。共同历史叙事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共同的认知基础和价值参照。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人工智能治理等议题上，任何单一国家的努力都不足以解决问题，唯有基于共同的历史理解，才能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意味着角色的重塑。我们不仅是过去的守护者、现在的观察者，更应是未来的设计师。通过重新审视和讲述过去，我们实际上是在编织和修补人类文明的意义之网。对于更广泛的知识界而言，这意味着话语模式的转型，是从“解构”走向“建构”，从“批判”走向“创造”，从“特殊”走向“关系”。共同历史叙事不是要终结差异与对话，而是要为差异间的对话提供一个共同的场域，让每一种声音都能被听见，每一种经验都能被尊重，每一种智慧都能被分享。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意味着集体意识的觉醒。在智能产出突破物理限制、知识的生产不再受制于传统成本法则的时代，真正稀缺的将不再是信息，而是意义；不再是计算，而是判断；不再是效率，而是方向。而人类共同的历史叙事正是意义、判断与方向的源泉，因为它能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指引我们“向何处去”，并赋予我们行动的理由与勇气。

历史上，每一次深刻的技术革命都伴随着历史意识的危机与重构。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从印刷术到互联网，人类不断面临“我们还能否讲述共同故事”的追问，也不断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找到新的叙事方式。今天，在普罗米修斯之火与奇点之思的双重考验下，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历史并未终结，人类的故事还在继续。只是讲述这个故事的方式、讲述这个故事的人以及这个故事的内容，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最终决定人类未来的，不是技术的指数级增长，而是我们能否在技术的浪潮中保持对“人”的理解，能否在历史的断裂处重建意义的连续，能否在多元的世界中讲述一个关于“我们”的共同故事。这正是历史学家——以及所有关心人类命运的人——在这个时代不可推卸的责任。

注释：

① Eddy Keming Chen, Mikhail Belkin, Leon Bergen, David Danks, “Does AI already have human-level intelligence? The evidence is clear,” *Nature*, February 2, 2026,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6-00285-6>.

②⑥⑬⑱⑲⑳㉓㉔㉕ Matt Shumer, “Something Big is Happening,” February 9, 2026, <https://shumer.dev/something-big-is-happening>.

③⑪⑲⑳㉓㉔㉕ 《我们，已迈过奇点》，2026年2月17日，<https://news.qq.com/rain/a/20260217A06WT200>。

④ Dario Amodei,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 How AI Could Transform the World for the Better,” Anthropic Blog, October, 2024, <https://darioamodei.com/essay/machines-of-loving-grace>.

⑤ 参见白珊珊：《人工智能在古典学研究中的应用》，《光明日报》2025年6月23日；周晓菲、王思婕、姚念达、易晋铭：《人工智能在世界史研究中的应用与反思》，《光明日报》2026年4月20日。

⑦ Richard Loosemore, Ben Goertzel, “Why an Intelligence Explosion is Probable,” Amnon H. Eden, James H. Moor, Johnny H. Søraker, Eric Steinhart ed., *Singularity Hypotheses: A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al Assessment*, Berlin: Springer, 2012, pp. 83-98.

⑧⑮ 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李庆诚、董振华、田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

⑨ 王诤：《“追求有利于学术”，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30周年》，澎湃新闻·文化课，2024年12月2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519332。

⑩⑳㉓㉔㉕ 吴晓群：《全球文明史书写与共同的历史叙事》，《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

⑪ 徐贵：《AI时代，文科还有出路吗？》，新京报书评周刊公众号，2026年4月13日，<https://mp.weixin.qq.com/s/4krl3wHyyQimGtSx5XrFwx>。

⑫ 关于“奇点”的讨论，可参见《大英百科全书》中相关词条：“Singularity”，*Encyclop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technology/singularity-technology>。

www.britannica.com/technology/singularity-technology。

⑬ I. J. Good, “Speculations Concerning the First Ultraintelligent Machine,” *Advances in Computers*, vol. 6, 1965.

⑭ Vernor Vinge, “The Coming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How to Survive in the Post-Human Era,” *Vision 21: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the Era of Cyberspace*, NASA Conference Publication 10129, NASA Lewis Research Center, 1993, pp.11-22.

⑯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关于全球史的时间问题》，张楠译，《复旦学报》2018年第1期。

⑰⑱ Joshua Sternfeld, “AI-as-Historia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28, issue 3, 2023.

⑲ 参见约翰·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葛甲福、来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⑳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3—45页。

㉑ 吴晓群：《普罗米修斯为什么要盗火——释读赫西俄德〈神谱〉中的奠基神话》，《江海学刊》2018年第1期。

㉒ 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㉓ Hans Jonas, *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 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㉔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2卷），梦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

㉕ Nick Bostrom, *Superintelligence: Paths, Dangers, Strateg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㉖ 俞金尧：《历史学：时间的科学》，《江海学刊》2013年第1期。



③④⑤⑥ 范丁梁：《概率与空间：大语言模型对史学思维的刺激》，《社会科学战线》2026年第1期。

③③ David J. Bodenhamer, John Corrigan, and Trevor M. Harris, eds., *Deep Maps and Spatial Narrativ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③⑤ 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耶尔恩·吕森、胡昌智编选，胡昌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③⑧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裴程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3年。

④⑩ 京特·安德斯：《过时的人》第1卷，范捷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74页。

④⑪ E. H. 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5—166页。

④⑫④⑨ 吴晓群：《人工智能浪潮下的史学研究：赋能与边界》，《社会科学战线》2026年第1期。

④⑭ The White House, “Launching the Genesis Mission,”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11/launching-the-genesis-mission/>.

④⑫④⑦④⑧ 张光伟：《AI时代历史学的价值升华与角色重塑——一个基于前馈神经网络模型的理论阐释》，《社会科学战线》2026年第1期。

⑤⑩ 徐国琦所提倡的“共有历史”强调三大特征：以“共有”为核心着眼于人类的共同旅程、彻底跳出民族国家的藩篱、关注个人与非政府机构的角色。这一路径的可贵之处在于揭示了一个常被遮蔽的事实：即便在冲突对抗的年代，不

同人群之间依然存在着“剪不断”的共有经历。然而，若要将其拓展为更具普遍性的共同历史叙事范式，尚需在本文所述的构建共同历史叙事的三个层面进行深化。

⑤⑪ 刘家和先生在比较中西古史时，曾指出不同文明对同一问题（如历史连续性与断裂）有着不同的应对方式，但这种差异本身也是人类共同精神遗产的一部分。若将这种洞见转化为叙事实践，则全球文明史的书写应自觉展示“差异中的关联”与“关联中的差异”。如此，历史便不再是平行线的并置，而是交织成的锦缎。

⑤⑫ 钱乘旦强调在世界史书写中应摒弃西方中心主义，重视除少数大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 and 文明的历史，注意人类交往的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尝试“把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用历史的事实勾画出来，写一个立体的历史发展过程”。

⑤⑬ 王晴佳：《放眼全球、再现亚洲：全球史在东亚的兴起、演变和前景》，蔡霁安译，《江海学刊》2023年第2期。

⑤⑭ 无论是吴于廑先生强调的“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还是刘家和先生揭示的“古代人类的精神觉醒”，其背后皆隐含着一种信念：人类在回应生存挑战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跨越文明边界的经验与价值，这些经验与价值虽以不同方式表达，却有着深层的相通之处。史家的责任，便是将这些相通之处从历史的尘埃中唤醒，使其成为未来人类共处的资源。

特约编辑 杨义成

简 讯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了第二批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重点专栏建设名单，《探索与争鸣》“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专栏成功入选。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重点专栏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设立，旨在通过重点专栏建设的引导示范，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学术导向、价值取向，紧密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应时代之问，繁荣学术研究。

《探索与争鸣》编辑部自2017年起开设“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专栏，在全国首家推出“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专刊，出版《省思：冷眼横看人工智能热》《人工智能与数字文明》等图书。10年来，围绕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组织了40余组圆桌笔谈和相关专题，举办了30余场相关会议，刊发了相关文章230余篇。据不完全统计，专栏80余篇文章被《新华文摘》等二次文献转载，文章在期刊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多平台综合阅读量突破60万。其中，ChatGPT相关组文在期刊微信公众号的阅读量累计突破10万。

此次入选是对《探索与争鸣》长期深耕人工智能交叉研究、服务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认可。下一步，编辑部将以“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重点专栏建设为新起点，通过组织高水平学术研讨活动，广泛发掘和培养中青年作者队伍，进一步建设相关成果展示与传播平台，将专栏打造成扎根中国、聚焦前沿、引领学术、服务决策的高水平学术高地。